

王晋卿先生传略

王维庭

一、家世、经历、事功及以民为本之经世思想。

清末民初，河北有经史文学大师，士林皆称王晋卿先生。先生名树楠，字晋卿，又号陶庐。先世于明永乐初自小兴州迁直隶之雄县。直隶今为河北省。万历时又迁新城，为新城著姓，自清道咸以来多以科名显。林则徐日记所称道光戊戌会元王振纲字重三者，即先生之祖。重三公养亲不仕，历任易县、涿县、新城书院主讲，弟子数千人。曾国藩为直隶总督，聘为保定莲池书院主讲，凡八年，终于书院，送葬者数百人。重三公有五子，连绵取科名。其仲子曰铨字子衡者，中咸丰乙卯举人，以教授终，即先生之父也。

先生天资锐敏，淹贯群籍，十六岁入邑痒，二十岁举优贡，二十五岁受直隶总督李鸿章聘为畿辅通志局分纂（黄子寿为总纂）。二十六岁中举人，三十二岁受冀州知府吴公摯甫之聘为冀州书院主讲。吴公与黄公力争而定约，半月在书院，半月在志局。光绪丙戌三十六岁成进士，时值清之季世。光绪戊戌，内忧外患纷呈，光绪发愤图治，受制于慈禧太后。后党帝党，日相水火。先生忧时念乱，知京官碌碌无可为，愿为亲民之官以自效，用户部主事换知县。历署青神、资阳、新津、富顺知县（属四川省）；中卫知县（属甘肃省）。超升平庆泾固道，超调兰州道，入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府，又入陕甘总督陶模幕府。未入张之洞幕府前，曾因错案落职；错案昭雪后，始署理中卫县事。

先生为政，以利民为本。民有所患，如为之除；民有所利，必为

之兴。善察民情，论卑易行，因势利导，害除而民不扰，利兴而费不繁。

先生知民之所利，尤在兴水利。在青神，修通废置四十年之鸿化堰，溉田两万余顷。其兴水利，功巨而费不繁，而利尤溥者，为治中卫修通七星渠。渠长百余里，废置且百年，分四段疏治，曲中要害，历二载渠成，使数十里之农田，皆变膏腴。由是青神、中卫两县之民，皆为先生立生祠，至今不废。

先生署理兰州道，察知全省厘金宿禁为民患，爰订新章，除烦苛，杜中饱。货物过境，只收落地税，一征之后不再征。行之八阅月，税收达银一百二十余万两，视往时岁入，增至三倍矣。

先生治兰州，大著声绩，钦授新疆布政使。至新疆，察知南疆农民之所苦，尤在官吏收粮草逾制，浮收高于原额，其数惊人。回民畏官如虎，积数十年，苛敛有增无已。先生深念民瘼，审势度情，制订新章，只准于原额之外酌收二三成以为养廉津贴。又制统一库秤，禁猾吏私制所谓官秤。严惩贪墨，革黜民之官四十余人而官风肃。由是，农民纳税岁省银四百万两，而库收却已增至数倍矣。

其清理全省厘金，因地制宜，因货制宜，使民利而税收大增亦类此。

先生勘察新疆，以为富源无穷：“地方二万余里，农田、水利、桑麻、瓜果之盛，畜牧之繁，五金之矿，富甲海内。”（《陶庐老人随年录》，以下简称《随年录》）惜往时岁岁坐仰二百万之协饷而不谋开发。先生今谋开发，先从改革币制入手。于是立官钱局，试发纸币一百万两。纸币流通全省，商民乐用。纸币兑现银，其值日增，直至纸币百两，易现银百二十余两。先生离新疆后，其所造纸币，仍照常行使，呼之曰“此老大人币也”。（尚秉和《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》）

先生深思熟虑，以为开发新疆之大计在办交通，而办交通在先办邮政。“而国家所设驿站，岁糜巨万，与民事毫不相关。自俄人由我站路设立台站，上接铁路以达京师；商民覩其往来之便，费廉而时速，远近函牒，争相送输，一岁入邮资至俄卢布十万以上，于是邮

政权力悉入俄人之手。”(《随年录》)先生陈说利害,使新疆巡抚联魁知邮政之不可缓,而俄人之操夺不可让;由是与俄人力争,收回邮权。“自办邮政,创办一年,而东西路通,二年而南北路贯,三年而天山以南诸府、厅、州、县巨干以次告成”。(同前)

先生更念开发固边之大计,在从蒙古草原有利地形筑路以直达京师。“新省西北为俄人铁路所包围,一旦用兵,朝发夕至;腹地之兵,非数月不能至新,而军火粮饷,又无一不赖腹地以转输,其胜败存亡之数,不待智者而决也。英人谓“新疆有铁路,则西域为中国所有;无则在俄人掌握,可预券也。”(《随年录》)当时朝廷既无远略,新疆大吏又复昏愆,故筑路之议,卒无由行。

先生怀长材远略,在新疆未尽其用,数十年之后,新疆之民犹怀思不忘也。

二、研经修史,贯穿百家上下古今;参稽西籍,为博雅通识之学。

先生之学,受之于祖于父于贵筑黄先生子寿,又与武昌张先生廉卿、桐城吴先生挚甫讲艺论学,遂摈弃少日所习骈俪之文,而为出入于司马子长、扬子云、韩退之之古文辞;更交纳海内鸿博淹雅之儒,取各流派之学以自广。

先生潜心著述,自入畿辅通志局始。是时莲池书院、通志局、总督署,皆在保定,四方博雅之士多来会于保府。继吴挚甫、张廉卿两大师而至者,曾纪鸿、薛福成亦皆来与先生纳交;更有通志局之崔迺猷、庄日豫诸贤士。先生与之质疑问难,几无虚夕。朋友讲习之乐,与名山之业相引发,其成书之捷,门类之富,引义之美,多出人意表。时桐城劳乃宣亦为通志局分纂,仅五六载即为山西巡抚曾国荃借聘而去。独先生以精壮之年,借师友之助,在志局前后十余年,通志成书,多出其手焉。

先生平生向以治学、讲学、著述为乐,出仕陇蜀二十余年,治民不废治学,居官不废著书。先生以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为基础以订经,以校书。先生深以乾嘉诸大师之学为然,对戴震、王念孙王引之

父子、钱大昕、孔广森等服膺甚至，认为其学乃研究周秦以降古代典籍之基础，亦为研究华夏古文化与古学术之基础。后学少年，渴求新知，急于求成，鄙薄文字，音韵、训诂之学，以考据为繁琐，谓无补于大义微言，此皆不足深论者也。今古相接，源流相续，摩天巨厦，起于平地，欲登无尽之学术高峰，前修曲折探求之历程何能背弃？华夏各门类学术之宝库，乃荟萃数千年无数先哲积累之成果，异同相取而俱进，新故相资而常新；欲执一而废万，或求万以废一，皆属形而上学一曲之见也。

先生治学，力除一曲之见，自觉将稽古与证今相结合，治一书与群书相结合，治经史与百家之学相结合，治考据词章与义理相结合，治中国之学与欧西之学相结合。兹略分五期，列举先生著述，间抒己见以与通人相质正；凡在畿辅，在四川、在甘肃、在新疆，在民元以后。

二十九岁，在畿辅通志局著《校正孔氏大戴礼补注》。中华书局汇编《清儒十三经新疏》收先生所注列孔书之后。《畿辅方言》二卷，列入《通志》。《中庸郑朱异同说》一卷，已刊行。

三十岁，著《尔雅郭注异同考》一卷、《建炎前说》一卷。方宗诚先生评说似刘知几《史通》。

三十一岁，著《墨子三家注补正》三卷。三家者，毕沅、王念孙、俞樾也。先生于《墨子》书多有创见，足以订正诸家之失。如《大取》之“大人之爱（小）人也，薄于（小）人之爱大人也；其利（小）人也，厚于（小）人之利大人。”先生删去四个“小”字，则上下文义通矣。下文“杀一人以存天下，（非）〔是〕杀己以利天下〔也〕。”其中“非”字改为“是”字，则文义通矣。又补一“也”字，则与上文句式取齐，文气亦足。维庭所著《墨辩会诂》采用先生之说，例多不悉举。

光绪丁卯，先生刊所注《离骚注》若干卷，多发新义，游国恩所著《离骚纂义》采入若干条。此书著年已不可考。

先生于《天问》亦有校订，如“冯翼惟像，何以识之”。先生谓“惟”应读为“无”。《礼·祭义》有“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养，无人为大。”

无，为也。言“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养，惟人为大。”先生又引《老子》上篇“天地开合，能无雌乎”为例，言唐《景隆碑》“无”即作“为”。王弼注亦谓“能无雌乎”之“无”与“为”为通用字。此尤足证“冯翼惟像”之“惟”应读作“无”。（见《陶庐笺牋·复张星阶书》）

先生校订《天问》，树义独精，前所未有的。游国恩《天问纂义》于此亦有未备，惜未收入先生之说也。

三十三岁，著《尚书商榷》三卷。谓“古今议《尚书》者，其说最纷；此书为订正江声《尚书集注音疏》与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之失而作。江书失在‘穿凿浅陋，又妄易经字’；孙书失在商周以下诸篇，多抄袭伪孔氏、蔡氏及王鸣盛、江声诸说之旧，苟且成书。”并与吴先生挚甫（著有《尚书故》）往复商订，故而名之曰《尚书商榷》。（参该书《自序》）

先生著是书，于旧注之失多所订正。如《盘庚中》：“其有众咸造，勿亵在王庭。”先生引《易·乾传》、《经典释文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、《汉书·楚元王传注》、《曲礼注》各书为证，谓其意当是“诸有众咸聚，怠慢在王庭，不欲迁也”。而往昔诸说皆曲。

先生三十七岁，得赵秉文《滏水集》二十卷之古抄本，病其体例未善，改编为《赵闲闲诗集》十卷，《目录》二卷，《编年》若干卷，共四十卷。此书收入《畿辅丛书》。

先生三十九岁在四川。其在青神，著有《广雅补疏》四卷，以补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之所略。先生最推重王氏之书，尝与友人书云：“《广雅》能补《尔雅》之所未备，而《疏证》则更能引申《广雅》之所未备，训诂渊薮，悉萃于此，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及之者也。树楠尝就所知者为《补疏》四卷。”（《陶庐笺牋·致王文泉书》）

《尔雅郭注佚存订补》二十卷。今人周祖谟《尔雅校笺·凡例》云：“清代学者有关《尔雅》的著作很多；在校勘训诂文字方面，以阮氏《尔雅校勘记》和王树楠《尔雅郭注佚存订补》比较详备。现在参取两家书……”

《尔雅说诗》若干卷。于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外，更辟新境，取《毛

诗故训传》以证《尔雅》，足与郝氏《义疏》相辅翼。惜并时诸老多未见此书，《陶庐丛刻》书目亦未列入，不审何年所著。北京图书馆有朱印本。

四十一岁在资阳，从洪雅萧履安学算学，著《天元草》五卷。以天元法推算“十月之交”日食年代为“周幽王六年十月朔辛卯日”。郑康成谓在厉王时，属误记。

四十六岁在兰州陕甘总督陶谟幕府。陶谟次子葆廉，字拙存，渊雅好学，博通中外；先生日与陶氏父子以学术相砥砺，时在甲午战败之后。甲午战败，签订马关条约，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二千两，割让台湾省及澎湖列岛，朝鲜独立，降为附庸。先生对此倍感悲愤，于光绪二十二年著《彼得兴俄记》，其《自序》云：“孔子曰：‘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’诸夏非亡，谓有君而不能君其国，故直谓之亡君。”此伤受制于慈禧之光绪皇帝，虽名为君而实已失君权，不如俄皇彼得犹能变法兴俄也。同时著有《欧洲族类略》五卷。

四十八岁在中卫县，治七星渠。其间曾答陶谟之问曰：“天下无不可为之事，但患人不为，非必不能为也。”于是著《蛰叟》七篇。盖寓身怀长才然未尽用之慨也。

五十一岁在中卫著《欧洲战事本末》二十卷，时值庚子八国联军蹂躏京师之后，论列交战国之胜败得失以为鉴也。先生尝论该书云：“归熙甫谓太史公《史记》叙始皇以后事始有声色，料子好故也。余之为此书亦然；凡料子好者，叙之皆有生气，精神焕发。”

五十二岁在中卫，著《希腊学案》四卷，序列希腊各哲学流派，如米勒森、伊利亚、安那沙哥拉、伊利斯、亚克特美与亚拉斯德等，凡十四家；与我国先秦孔、墨、老、庄之学说作比较研究，赞扬希腊学者之创造精神（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史学史》二至九页《希腊学案》）。中国学者用比较方法研究西方哲学流派，当以先生为最早。

五十六岁在兰州道署，著《希腊春秋》八卷。

五十六岁至六十一岁，在新疆开通志局。新疆与蒙、藏、甘、青相连接，地广物丰，为祖国大西北国防之要冲。先生官新疆布政使，

素以开发与保卫新疆为先务。调查国界，著《新疆国界志》八卷。考察山脉，著《新疆山脉志》六卷。新疆开通志局，先生为总纂，聘宋芝洞、裴伯谦等为纂修。创订凡例，分《建置志》、《国界志》等二十九类，三年成书，共一百一十六卷。

先生纂成入志者，还有《兵志》二卷，《访古录》二卷，《新疆小正》二卷，《礼俗志》二卷，《道路志》四卷，《土壤志》一卷。《建置志》仿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先成一卷，由宋芝洞续成。《实业志》由先生创撰《森林》、《渔业》两门，由门人鍾鏞续成。全志最后由先生修改定稿，命名为《新疆图志》。此志网罗宏富，考订亦不乏精审之处；然终因合众手而成书，前后定稿更非一人，故重复杂乱在所不免，令人惋惜。然此志总不失为清末以来研究新疆问题之要籍。先生独撰各志，如《国界志》、《山脉志》等，更为研究中苏边界之重要文献；东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大西北问题，多以此书为重要依据。罗振玉、徐旭生先后至新疆考古，皆以《访古录》为先导。《新疆图志》曾由东方文化协会重印，采图志合一版式。

一九三二年，维庭游学故都，尝以开发新疆之事问先生。先生谓左文襄收复新疆，志得意满，未及开发；因兵无室家，故不得留而屯田。杨增新治新疆多变荒芜为膏腴，有开发功；然不能筑铁路，谓防乱自外入。此公多猜疑，多积怨，变起于内，以被刺终。

先生又谓研究新疆问题，当从研究古国沿革入手，清人书多未可据，惟徐星伯谪戍伊犁，走遍天山南北两路，记其山川道里，著《新疆识略》，为详确也。

中华民国建立，先生由新疆还至京师，年已六十二矣。在民元以后二十余年，以著述终。

著《武汉战记》，敌视革命，士论惜之。入清史馆为总纂十余年，著咸同列传、《食货志》、《地理志》等。遗老修史，以封建制度之是非为是非，故《清史稿》实为封建时代旧史之终结。《清史稿》的修撰，秉笔之人各怀歧见，无由画一。总纂五人亦争论不休，故未能反复审定，统一整理，由是而牴牾错乱，重见迭出。且又有关内本、关外

本之别；关外本更经妄人擅改，即纂修之姓名，亦多改纂。然终因网罗一代二百六十余年之史事合为一编究非易事，故而有其存在之价值；后来研究或重修清史者，亦必以是书为主要参考之文献。是书有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之校点本，计四十八册，五百二十九卷。

先生在史馆，又曾代徐世昌纂成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四十卷，《畿辅列女传》六卷，《将吏法言》八卷，《大清畿辅书征》四十一卷。徐世昌主编《晚清簪诗汇》，先生为纂修之一。在此期间，先生还自著《学记笺证》四卷，《说文建首字义》四卷，《周易释贞》二卷。

七十八岁至八十岁在沈阳，为萃升书院主讲，著《春秋左传集注订诂》八卷。

八十一岁至八十三岁回旧京，著《左氏经传义疏》一百二十卷。

八十三岁，重修《新城县志》二十四卷。先生在此《志》中论修志之体例云：“邑志必以地为经……记地事，道地愿，辨地物，知地俗，以求地应。”又云：“志者，史之例也。史记一国之事，则去取不得不严；志记一隅之事，则去取不得不宽，故省、府、邑志，递加详焉。”傅振伦尝评论云，先生一生完成方志著述之多，是我国方志编修史中所少见的；又尝称述先生修志体例之美，谓应为“后人修志所仿效”（参见傅振伦著《中国方志学通论》）。

又修《冀县志》二十卷，《法源寺志》八卷。

又著《陶庐文内集》三卷，《陶庐文集》二十卷，《文莫室诗集》八卷，《陶庐诗续集》十二卷，《故旧文存》若干卷，《陶庐笺牋》四卷，《陶庐骈文》一卷，《陶庐外篇》一卷，《陶庐随笔》若干卷，《诗话》若干卷，《清人语林》四十卷，《三食神仙字斋杂记》十五卷，《庄子大同说》二十二卷。

《冀县志》以下各书著于何年，未详。

八十五岁，著《焦易说诗》四卷，《河北省通志》若干卷。《河北省通志》先生为纂修之一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，沈阳驻军不设防，日寇长驱直入，辽沈

失地数千里，先生集李义山诗，有“奉天城垒长春苔”之句，又填词三阕，以讽张汉卿将军；实不知弃地资敌者乃中枢窃国大盗，而非将军之过也。

日本飞机侵入北平上空，先生门人日人林出贤次郎欲迎先生至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，先生峻拒之。

先生于清季以文章名天下，被称“固当时北方之雄”（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中语），《康有为墓表》、《廖季平墓表》皆出先生之手。回忆一九三三年夏，陈散原先生在旧京，与先生相会，年皆八十余矣。

一九三五年春，先生设宴于寓庐，与散原相聚，各出所为文以相质；先生出所为《廖季平墓表》，散原出所为《马通伯墓志铭》，对参互校，各删改一两字。余亲见其改易之稿，叹为艺林盛事。先生谓余曰：“散原文与吾异，吾重之，子往以文求教。”惜其时余已受邢介秋之聘，将赴濮阳防汛，未及谒散原而之河上；继之又辗转赴广州，应姜叔明写书之聘而离河上。

卢沟桥告变，御寇军兴，余更流亡入川。战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，研究中国哲学史；旋调河北大学，为哲学系讲授中国古典哲学，久未下笔为古文辞，古文辞亦不为世所重。张季同岱年老友嘱余为陶庐、北江两先生作述学之文，追怀昔年所见陶庐、散原相质之文，犹能仿佛其神韵。散原之文，以典雅峻洁胜；陶庐之文，以渊懿雄奇胜。以陶庐毕生肆力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，包古今中外而为学，熔经史百家而为文，不株守一家之学，亦不株守一家之文，故得造境如此也。由先生之遗教引而申之，其意量远矣哉！

《清史稿·洪秀全传》亦先生所作。清室以洪秀全为大盗，而先生之论则云：“秀全以匹夫倡革命，改元易服，建号定都，立国逾十余年，用兵至十余省，南北交争，隐然敌国。”又云：“成则王，败则寇，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。”遗老而敢发如此惊人之论，无怪《清史》定稿，总纂之间争论不休也。然先生不痛斥洪氏革命，而敌视武昌起义，盖天京不废君臣上下之制，而中山先生之革命，在扫

除数千年之帝制也。

先生亦尝出任民国议会议员，而又恋恋于君臣之义；以不忘君臣之小义，而忘孔子大同公天下之大义，则维庭不能不为先生痛惜也。

先生所为诗，合杜子美、韩退之、李义山为一体，渊雅雄奇，亦当代所稀。《陶庐诗集》载，康同壁尝以长素变法失败后出走遗诗，求先生题跋，先生为题五律一首，其中有句云：“有志竟无成，仓皇出帝京……君亲余涕泪，悲喜不胜情。”此诗确有唐人品味，一结蕴涵无穷，神韵逼近少陵。

廖平尝以酒肴汤饼设宴于凌云山寺以饷先生。先生别后以诗戏之云：“嘉陵城头有一士，舌尖狂澜泻江水。呼厨挈榼载召我，饫听先生说经旨。君言圣学有古今，我言圣饌亦如是。”先生又自注云：“廖平以《周礼》为古学，少年时所习；《王制》为今学，老年时所订。”此诗隽语神似坡翁，而俊逸雄奇犹有过之者。

先生对科举取士之弊深有所感，尝有言曰：“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为千古诟病。不知所焚书，皆揣摩时尚辩言乱政之书，如今之时文试帖之类；所坑者皆当时游客策士、亡人家国之儒，如今之举人进士之类。”（《陶庐笺牍·致何善孙书》）先生三十六岁成进士，取高科，然为文痛诋科举取士之弊，以为其所取者皆空虚无用之文，其所选者皆庸碌无用之人，盖因多年为官，亲历亲见，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也。

先生患人口失控，后患无穷，尝作《节园杂感》云：“粤若稽古初，人类本有限。生生逮于今，繁衍不可算。茫茫五洲土，人满实为患。喧填塞盖壤，造物亦思变。或毙之疫病，或饿之水旱。或夷之外寇，或贼之内乱。天生杀人具，火器愈变幻。畴其主宰是，人力恐难捍。势如泉始达，更若火方燿。杀机起西方，终乃变震旦。吁嗟生不辰，过此更可叹。”《兼于阁诗话》引此诗而评之云：“直似一部马尔塞斯人口论……距今六十七年前，中国人口号称四百兆，今又倍而过之，使生在今日，又将如何？嗟哉！”

六七十年前，先生作诗，已以中国人口失控、繁衍过速为患，以视建国后，中国人口已逾六亿，犹有痛诋马寅初人口论之大人物，仅就此事而论，其识力与意量之高下，将何如耶？

先生论诗，尤具特识。其论陶诗云：“陶公诗皆忠义悲愤之作，而故作隐语以避祸。其志大，其意悲，后之读公诗者，皆以貌取之者也。”且评论其《咏贫士》诗云：“‘万族皆有托’，悲二臣也。‘重华去我久’，念旧君也。曰‘凄厉岁云暮’，悼世乱也。曰‘荣叟’，曰‘原生’，曰‘黔娄’，曰‘仲蔚’，思节士也。曰‘量力守故辙，岂不寒与饥？知音苟不存，已矣何所悲。’曰‘此士胡独然？实由罕所同……人事固以拙，聊得长相从。’此久谋兴复晋室，而痛恨当时无与同志者。”又评论其《拟古诗》云：“‘辞家夙严驾，当往至无终。问君今何行？非商复非戎。闻有田子春，节义为士雄。斯人久已死，乡里习其风。生有高士节，既没传无穷。不学狂驰子，直在百年中。’观此，则公之号召义士，图谋恢复之心益显。杜子美《遣兴》诗讥渊明《责子》诗为不达道。不知渊明之意，盖痛责当时之臣，无同志者。《责子》诗末云‘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’，实悲愤极矣。陶公诗大都激昂沉痛，而词意深厚，使人不觉。”先生亦尝云：“古之能文者，如太史公司马子长，枚叔、扬子云氏，大抵如此。故读公诗者，学其一字一句，以为拟陶，真梦呓也。”（此段引文均见《陶庐笺牒·复张星阶论陶诗》）

惜晚岁所为诗，多发黍离之悲，恋恋于曼殊，盖为亡清唱挽歌也。然不入日本使馆，拒受伪满皇帝之聘，则“清白不污”四字，亦当之无愧也。

若论先生之一生，仍当以其著述之弘通渊懿为主，而尤以《新疆图志》之有裨于巩固国防与开发大西北为后世所推重。至其居官数十年，则不愧为循吏，此则为陇蜀天山南北之民至今犹念念不忘之由也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